国外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邱　　克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郑和历时二十八年的航海活动，不仅表现出十五世纪初叶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光辉成就，还发展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自上世纪末，国外学者就开始对郑和下西洋的背景、过程、航海造船技术以及史料、传说等进行全面的探讨。其中许多研究成果对于国内学术界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正在掀起新的“郑和研究热”。在这种形势下，对几十年来国外主要的研究成果予以介绍，以供国内研究者们参考，进一步推动这一研究走向深入，是很有必要的。不当或阙漏之处，盼得到批评。

国外最早研究并向西方介绍郑和下西洋的是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1831—1878)。梅氏1859年来华，1871—1878年曾任汉务参赞（汉文正使)，撰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1874—1875年，梅辉立在《中国评论》(英文）第3—4卷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摘要翻译了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部分史料，并对其中的地名和民俗作了考证。翌年，格伦威尔德（W.P.Groeneveldt）也在《从中国史料看马来群岛和满剌加》(巴达维亚，1876年）中摘译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明史·郑和传》的部分章节。后来，菲利普斯（G.Phillips）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亚分会杂志》第20—21卷（1885—1886年）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港口》，也利用了马欢和费信的著作。1895—1896年又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摘译了《瀛涯胜览》，并最早向西方刊布了《郑和航海图》。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Schlegel，1840—1903)曾于1898、1899、1901年在《通报》上以《地理考证》为总题目，对郑和途经的锡兰、彭坑、满剌加等十余个古国进行了考证，也用英文选译了马欢和费信的著作。美国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写过《十五世纪中国与东部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与贸易》(《通报》15—16卷，1914—1915年)，此文前半部介绍了宋元以来的历史资料，后半部按国别翻译和考证了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史料。1915年，法国沙畹（E.Chavennes，1865—1918）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介绍了不久前发现的锡兰郑和布施碑记。

以上可算是西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和介绍有关郑和的基本史料，并开始进行细致的研究。虽然其中存在不少错误和遗漏，但为以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二阶段以荷兰戴文达（J.J.L.Duyvendak，1889—1954年）和法国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为代表。戴文达于1912年来华，先后任驻华使馆

通译生和副通译官。1933年，他出版了《马欢重考》(阿姆斯特丹)，对以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并进而作了新的详细考证。伯希和称许此书为“颇有功益”之作，伯氏著名的论文《十五世纪初中国人伟大的海上航行》(《通报》1933年第30卷，冯承钧中译本为《郑和下西洋考》，商务1934年）就是专为评述戴文达这部书而作的。1939年，戴文达根据新发现的《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和《江苏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年月和航程又作了全面的考证。这篇长文题为《十五世纪初中国人海上远征的确切年代》(《通报》第34卷)，与伯希和之文同被誉为西方研究郑和的权威之作。同年，他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长颈鹿》一文，提出长颈鹿的名称和外形与中国人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十分相似，它巧妙切合风尚，成为圣德、圣世的象征。正是这种长颈鹿促使中国人航行到了非洲。也是在这一年，戴氏还用法文撰写了《郑和航行抵达东非海岸：1416—1433年》(《非洲与埃及制图学杂志》第四卷)。1947年，戴文达应邀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对于非洲的发现》的著名讲演，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伦敦，1949年)。1953年，他发表了《〈西洋记〉散论》(《通报》第42卷)。他认为，罗懋登以郑和航海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通俗演义》虽有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但为研究郑和使团的组织、相互馈赠的礼品，以及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提供了可靠和详细的资料。

权威的西方汉学家伯希和在郑和研究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冯承钧曾说过，在西方研究郑和的学者中，“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由于当时所见资料有限，特别是尚不知道长乐和刘家港的郑和碑记，伯希和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疏忽和错误，其中有些已在以后撰写的《郑和及其航行补证》(《通报》1934年31卷，和《再论郑和的航行》《通报》1935年32卷）得到修正和补充。

此后，西方对于郑和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英国学者米尔斯（J.V. Mills）和李约瑟（J.Needham)。米尔斯研究的重点是航海造船技术以及航海史料的翻译、注释，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的西方汉学家。米尔斯的主要著述有:《武备志海图中的马来亚》(《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37年15卷)、《论早期中国航海》(《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1年3卷)、《中国沿海地图》(《Imago Mundi》1954年2期)、《中国最大木帆船及其排水量》(《航海宝鉴》1960年46卷)、《马欢：〈瀛涯胜览〉译注》（剑桥1970年)、《十六世纪前后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在马来水域的航海活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74年226卷)。其中以《译注》一书贡献最大，它标志着西方的郑和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书的导言很长，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了郑和的身世，七次下西洋的年月、航程、航线、船只等问题，然后叙述马欢的生平、《瀛涯胜览》的版本、内容、价值和同时代其它的史料。此书主要部分是对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的翻译和注解。在东南亚地理和民俗方面，米尔斯有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附录是八篇单独的论文（参见美国陈学霖的述评，载《东南亚研究杂志》1975年6期)。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郑和下西洋曾化了相当的笔墨，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郑和航海的明显意图是“向所有国家，甚至包括远在他们已知世界之外的国家显示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上强大的国家”(第一卷)。后来李约瑟又说：郑和“探险的航程愈远，到达地方愈多，他们对于自然奇珍的搜求变得愈重要，而对于要求海外

诸王承认其臣属地位之事却反而越不重要了”(第四卷)。关于郑和下西洋终结的原因，李约瑟认为可能与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的竞争有关，其后果是对印度洋的统治权落入了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之手（第一卷）。“这一结果不仅对中国历史，甚至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四卷)。李约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点也是在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方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见澳大利亚学者王赓武的研究。他在《中国和东南亚：1402—1424》(载《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史研究论集》，剑桥1970年）一文中指出，郑和下西洋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自永乐个人对东南亚的兴趣。他在另一篇《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坎布里奇1968年）特别指出郑和远征与扩展朝贡制度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里包含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认为的所有外国人都一律平等和应该一视同仁的思想。王赓武的《南海贸易》(《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58年31期）和《中国与满剌加关系的建立：1403—1405年》(载J.S.巴斯丁等编《马来亚与印尼研究》，牛津1964年）也专门论及了郑和与东南亚的关系。其它有关论著有：谢巴德（M.C.Sheppard）的《郑和将军的惊人航行》(《海峡时代年刊》，1955年)、《永乐皇帝与郑和将军》、《郑和时代的满剌加》（《历史上的马来亚》，1957年3—4期)；费子智(C.P.Fitz Gerald，1902—)《中国人向南的扩张》(伦敦1972年)；许云樵（Hsu Yun-tsiao)《元明时代航路的改进及其在东南亚史上的影响》（《中国文化》1978年19期)。许云樵创立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进行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如许云樵写过《三保太监下西洋考》（《南洋学报》五卷一辑)、陈育崧《巩珍〈西洋番国志〉的真伪问题》(同上，十五卷二辑)；饶宗颐《〈西洋番国志〉书后》（同上，十六卷一、二辑)。此外，他们正着手合校《瀛涯胜览》、《三宝征彝集》和《西洋番国志》，以《三宝合参》书名出版。

关于郑和与非洲的关系，除上述戴文达之外，还有施瓦茨（E.H.Schwarz)《中国与非洲的联系》（《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孟加拉1938年4期)；卡麦尔（Y.Kamel)《郑和的航海》（《非洲与埃及制图学杂志》1939年4期)；弗里坡（C.E.Fripp)《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国内事务部年报》1941年18期)；张桂生（1921—)《中国有关非洲最早地图的重新考察》（密执安1957年)、《明代海上事业和在大发现时代以前中国关于非洲的知识》(1971年)、《伟大的中国探险家》(密执安1955年)；西文（N.Sivin，1931—)《哥伦布之前八十年中国两万七千人的舰队到达非洲》（《科学美国人》1972年1期)。意大利学者费莱西（D.Filesi）的《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关系》(米兰1962年；英译本1972年)，其中一大半都是讲述郑和与非洲关系的，如第五章“明初中国人的西进”，第六章“中国对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的记述”，第八章“郑和下西洋的年代”，第九章“郑和的两块碑记”，第十章“中国对西洋和非洲远征的结束”。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中亚，美国中亚史学家罗塞比（M.Rossabi，1941—)曾专门写过《郑和与帖木儿有何关系》（《极远东》20卷3期，1973年）。另外，其它几部较有影响的西方著述有：法国考尔迭（H.Cordier，1849--1925）的《中外关系通史》(巴黎1920—1921年)，美国费正清（J.K.Fairbank，1907—）和赖绍华（E.O.Reischauer，1910—）合著的《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傅路特（L.C.Goodrich，1894—)《中国人民简史》(伦敦1957年）和罗荣邦（1912—)《明初海军的衰微》(《极远东》1958年5期）等。

在十五世纪初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的研究方面，最吸引学者们注意的是《郑和航海图》

和郑和最大宝船。对于前者，M.G.菲利普斯在1885年）和杰里尼（G.E.Gerini）在1909年都作过详细考证。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格登（C.O.Blagden）发表的《马来史研究》（《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杂志》53卷），他逐一考证了图中马来半岛东岸从孙姑那到半岛西岸的古力由不洞等十六处地名，1937年，米尔斯在《武备志海图中的马来亚》研究了其余三十五个地名，并高度评价了《郑和航海图》的准确性。他认为，在马来水域的四十个可以追溯其语源的地名中，有十七个是中国人命名的，如"将军帽"(Pulau Tınggi)，十七个是从马来地名按厦门等方言翻译的，如"昆宋屿"(Pulau Pisang)，还有六个是马来地名的意译，如"九洲"(Sembilan，即"九"的意思)。据认为这种航海图的传统很可能是绝对中国式的。1615年之前，在马来水域活动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葡萄牙人一直不知道（起码未使用过）《郑和航海图》中所标注的针路。马尔德（W.Z.Mulder）在《武备志海图》（《通报》1944年37卷）中从领航员的角度研究了海图，并对米尔斯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戴文达曾认为郑图可能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但在1947年《中国对于非洲的发现》讲演中指出，"这些航海图，实际上是中国人在这几次远征中所得到的知识成果。"他在另文《中国航海家的航行指南》（《通报》1939年34卷）中还对牛津大学所藏《顺风相送》等抄本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航行日志无疑也保留了郑和伟大航海的成果。这些图与《武备志》海图有很大关系，很可能就是《针位编》的一种（虽然现存的只是更早手稿的抄本），它们包含了无数次航行所积累的知识。还可参考傅路特《葡萄牙人东来以前中国航海图与阿拉伯航海图之间联系的质疑》（《爱色斯》，1954年44卷）。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2章也认为这些图应视为中国的航海图，它们与西方航海图在形式上很不相同，但在性质上却很相似，在时间上（十五世纪初）也差不多相同。虽然由于极端的图解式，《郑和航海图》显得非常失真，但图中针位的误差一般不超过五度，这对1425年的舵工来说可以认为是极好的了。

米尔斯等人还根据《郑和航海图》所标注的针位，对郑和船队的航行速度作了推论，即图中的一更约等于2.4小时。在障壁海域，从苏门答剌到白礁（Pedra Branca）平均每小时行驶2.39哩。最快航速为4.5哩/小时。最慢航速平均1.8哩/小时。而在开阔性水域，郑和船队的航速更快，从白樵到东竹山（Pulau Aur）平均每小时6.25哩。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争论也很大。1876年，格伦威尔德提出郑和宝船长达44丈是绝对不可能的。唐纳里（I.A.Donnelly）《论古代中国船舶与贸易》（《航海宝鉴》2卷1925年）也认为《明史》的记载显属夸张。1973年，英国内什（G.P.B.Naish）在评介李约瑟著作时更极力主张郑和宝船的尺度（尤其是船宽）不可靠。1843年的英国轮船"大不列颠"号（Great British）长宽为87×15米，1898年的巨型轮船"大伊斯顿"号(Great Estern）的长宽也不过204×25米。特别对诸如蒙巴萨这样的小港而言，郑和的大船显得极为笨拙，停靠码头、寻找领水员都非常困难(《船舶考古学与水下探险国际杂志》2卷1973年)。罗荣邦在《宋末元初中国作为海上强国的出现》（《远东季刊》1955年14期）和《明初海军的衰微》中根据对郑和出使的总人数与所乘船舶总数的比较，认为十五世纪中国船只的平均定员为450—700人。由此计算，郑和船队的平均载重量为500吨。因此，建造如此巨大的宝船实属没有必要。他提出"料"是中国古代计算船舶载货量的单位。根据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郑和船队中最大载重量的船只仅有二千料，约为500吨（排水吨位为800吨），这仍然比当时

葡萄牙人的船只要大得多。可是，罗荣邦又相信宋代的海船规模更大，并援引《梦梁录》“大者五千料”，“中者二千至一千料”的记载，认为五千料船的载重量为1200吨。这样的话，郑和最大宝船就仅相当于宋代的中小船舶。那么，又如何解释目击者对于宝船“巨无与敌”，“盖古所未有”的描述呢？对此罗荣邦缄默不谈。

米尔斯在《最大的中国木帆船及其排水量》一文中提出，从整个航海史来看，建造四十余丈长、排水量为八千吨的木帆船是有可能的。中国在元代就建造过比郑和宝船更为庞大的木船。长宽比2:1也是完全可能的。十七世纪以前海船的龙骨长度与船体最大宽度之间通常都是这个比例。与此同时，米尔斯也觉得“中国史家有时喜于夸张，也可能船用尺比明工部尺要小一些”。但是，有各种理由说明郑和最大宝船的实际长宽尺度应为30余丈×15丈，排水量3100吨，载重约2500吨。米尔斯在《马欢:〈瀛涯胜览〉译注》导言又补充说道:“据《明史》言，郑和第一次航行，造大舶六十二，但如果说这里所指的是郑和率领的全部船只数量，或者所有船只都是这种同一的规模，那都是令人不可想象的。”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颇有卓见的。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中提出，郑和宝船的真实尺度问题是船舶考古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西木帆船的建造传统是不同的。整个中世纪内中国船舶的吨位比之欧洲要大得多。因此，他认为《明史》有关宝船尺度的记载“大概还是可信的”。中国传统造船的出艄约百分之三十，所以郑和最大宝船龙骨的实长只有31丈，如有三个接头，分为四节，每节长度约8丈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船宽，有人提出最大宝船的船幅尺度应包括主帆的最大宽度。但李约瑟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最大宝船的形状虽然很宽，但可以从其它来源的材料得到证实。整个郑和船队的各种船只，从九桅船到长度只有最大宝船十分之一的单桅船，其长宽比都是大致相同的。李约瑟最后说，中西造船的最明显区别即在于，中国大䑸宝船队中有极为巨大的宝船，而达·伽马的船队中却没有一条超过三百吨，有的甚至更小。“在造船方面，中国曾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第425，480，509页)。

俄国和苏联学者对郑和下西洋也有不少研究。还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研究中国植物和中西交通史的学者贝勒（E.Bretsheider，1833—1901）在任驻华使馆医师期间，就写过《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交往》（《中国评论》4卷1875年），在早期研究郑和的西文著述中有一定影响。著名汉学家比丘林也曾翻译过与郑和出使南亚、西亚诸国有关的史料。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联学者开始以新的观点对郑和下西洋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斯维特(Я.И.Сьет)曾发表过不少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著述，主要有:《郑和的伟大远航》（《知识就是力量》1954年3期)、《十五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海家的远航》（《科学技术史问题》1957年3期)、《沿着东方旅行家和航海家的足迹》(莫斯科1955年）和《航程万里》(莫斯科1960年）等。斯维特比较了马欢、费信的游记与周去非、汪大渊的著作，认为宋元学者所提及的许多较小而且联系极少的陌生遥远之国，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已成为中国人世界观念中不可分离的和能予详细了解的部分。而这正是郑和下西洋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总结。

伯克夏宁（A.A.Дóкщанин）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包括:《十五世纪初郑和远航非洲诸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6期)、《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地名学中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亚洲人民研究所学术简报》85辑1964年)、《中国史学家对于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1981年)、《十四——十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

国》(莫斯科1968年)、《十五世纪初叶的中华帝国》(莫斯科,1976年)等。他的研究在苏联学者中是最为全面深入的。他提出郑和是第一个开辟通往非洲道路的中国人,认为戴文达的郑和使非乃是为寻找长颈鹿之说毫无根据。明成祖曾表示:"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大事是同远方诸国沟通友好关系。他还提出,《明史》虽记载了郑和第七次航行时曾访问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但在其它有关史料却得不到佐证。据他推测,郑和到达忽鲁谟斯后,便没有继续指挥他的船队。当时船队的一部分在古里稍事停留即返航中国,而另一部分人到达天方,经陆路历时一年回国。真正去非洲的是洪保太监。这一推论今天看来不无道理。伯克夏宁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第二章中,认为郑和下西洋有政治、经济的双重目的。政治目的是采取新的外交政策,通过向南海、西洋的多次远征,进一步巩固中国对南海诸国在名义上的宗主权。他极不赞同踪迹建文或耀威异域说。"二帝之心,岂真欲夸多斗靡于远方哉?"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异域(马欢诗)"。这里的"纶音"即是表达了中国皇帝对海外诸国的最高宗主权。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是扩大海外贸易。这在十五世纪初符合国家的经济利益,也特别符合经济文化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大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愿望与要求。伯克夏宁认为郑和远征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当时与中国有使节关系的"朝贡国家"的范围,南海诸国派往中国使团的数量骤增,对中国在各方面的宗主关系大大巩固。但中国的这种宗主权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郑和率领船队多次远航,却从未在外国留下一艘船、一支部队,在满刺加和苏门答剌建立的基地(官厂)也没有中国驻军。甚至对实际控制旧港地区的海外华人,中国政府也和其他周边番王同样看待,只限于要求形式上的宗主权。他通过中西早期殖民在目的、性质上不同的比较,分析了中国为何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殖民政策和海外贸易的原因。

伯列芙斯卡娅(Н.Е.Боревская)的《早期中国历史演义的史料来源》(《亚非人民》1973年3期)认为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的通俗演义》为研究中国长篇叙事体小说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西洋记》采用了许多对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很典型的形象化描写。她以传国玺、女人国、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等为例,详征博引,分析了作者从新的角度进行再构思的过程。

苏联学者还注意中国研究郑和下西洋动态的评论。伯克夏宁在《中国史学家对于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中,对三十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主要史学家的观点作了介绍和评述。他说,大部分中国学者都倾向于从分析明初中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入手来寻求郑和远征的原因并评价其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水平并没有全部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者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郑和远征的结果与中国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问题也未能得到应有的研究"。类似的述评文章还有图托夫的《朱偰〈郑和〉一书简介》(《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1957年22期)。

笔者对于日本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概况所知甚少,这里主要根据庄景辉同志提供的资料作一简介。

在地名研究方面,有北村松之助、国井清音《〈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地名考》(《史学杂志》十四卷1903年)、石泽发身《十五世纪支那旅行记中之南洋地名考》、藤田丰八(1869—1929年)《大小葛兰考—〈星槎胜览〉的价值》(《史学杂志》二十五卷,1914年)。藤田丰八

指出，费信的这部书多引《岛夷志略》，仅稍改字句，误解、臆改之处甚多。如“麻逸”与“麻逸冻”、“大葛兰”与“小葛兰”，“古里”与“古里佛”都是如此。他还较早提出了《武备志》未载《郑和航海图》的问题，认为“此图所载航海之路程，及海图之列次，大致无误，并与明中叶以后杂出之剿说不同。”这一肯定的说法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山本达郎（1911—）《郑和西征考》（《东洋学报》21卷，1934年）也曾引起我国早期研究者的重视。

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有高岩氏（1884—1968）《郑和的南海经略》（《历史与地理》1卷，1917年）、《明代的船舶与航海术》（《地理教育》22卷，1935年）、桥本敬造《郑和的航海》（《东方学报》1968年39册）。

关于郑和下西洋史料学方面的研究，有坪井九马三《论明代钞本〈星槎胜览〉》（《史学杂志》29卷，1918年）、可儿弘明《费信所见闻的十五世纪初之南海渔事》（《史学》33卷，1960年）、小川井博译注的《马欢：〈瀛涯胜览〉》（吉川弘文馆，1969年）。石田干之助（1891—1974）《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生活社1945年）的第六章题为“明初有关南海知识的扩大”，其论述了郑和在南海的远征，郑和远征的文献记载以及西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状况。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29章曾提及阿拉伯史料里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述（490页）。1970年，家岛彦一果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也门拉土鲁王朝（1229—1454）有关郑和第5—7次下西洋期间派船队访问也门的新材料。家岛对这些材料作了较好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伊斯兰史料中的郑和远征记事》（《史学》38卷，1966年）、《从伊斯兰史料看郑和的远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968年1号）和《十五世纪印度洋通商史之一页——郑和远征分队访问也门》（同上，1974年8号）。日本学者对中国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动态也极为关心。郑鹤声、郑一钧合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出版不久，小川井博即撰文加以介绍和评述（《东南亚历史和文化》1982年11月）。

日本研究郑和的其它著述还有：桑田六郎（1894—）《〈皇明实录〉所载明初之南洋》（《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研究年报》1937年四辑）、浅海正三《五百年前南海的开拓与郑和》（《历史》18卷，1943年）、李献章《从明廷之海外宣谕看妈祖的传播——特别是有关郑和西征时的灵验》（《中国学志》1964年第一本）、和田久德（1917—）《十五世纪初的苏门答剌华侨社会》（《茶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1967年第5号）等。

日本研究郑和的最新成果是清水书院1981年出版的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1931—）著述的《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这部书共分四章，包括序、跋和郑和年谱。第一章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第二至三章介绍郑和身世、出洋的舰队的组织，并利用中国和伊斯兰史料，详细论述了郑和出使的年代、航线及所到国家和与各国展开贸易活动、进行友好往来的状况。第四章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动因和终止，还谈到明代航海术、造船技术的成就、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和海外的遗迹等。这部书已由庄景辉译成中文，即将同大家见面，这对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